

消失的老文化馆

清明时节,一辆南京牌照的汽车,停在了滨海县城前河的岸边。

几位中年人从车上走下来,钻进一条窄窄的巷子。他们在寻找一个地方,寻找一段曾经与他们紧密相关的记忆。但那座承载着记忆的建筑——旧的“滨海县文化馆”已经不存在了。

这个发现让他们念叨“老文化馆”的频率更加高了。他们急切地想要找回这段记忆。

四十多年前,一批当地少年曾不约而同地走进“老文化馆”,并在那里遇见和成就了一段传奇。他们是顾宝新、曹干、林彬、顾正军,在这个县城小馆中避过了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之后,如今他们的名字在书画界熠熠生辉。

“这是我们的‘大学’。”林彬说,老文化馆不仅跟他们的成长有关,而且可以说是滨海文化,特别是书画艺术的根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

苏北小城的文化中心

每个县城都有一座文化馆,滨海也不例外。

文化馆是普及和宣传文化的地方,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,有戏曲、有音乐、有美术。滨海的特色是美术。

这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,它有一个大画廊,或者叫书画长廊。它始于1958年,到1964年时,已经被扩充到3.4华里长,绕了老县政府整整一圈。

这个画廊大概有200多块展板,主要是展示最新的美术作品,有连环画,也有国画、宣传画和摄影作品。

内容主要是为了宣传当时的政策、法规、新人新事。

顾正军的回忆里,画廊一个月就更新一次,创作量巨大。作者主要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,乡镇文化站的人,以及后来的知青、下放到滨海的艺术家们。

顾正军的启蒙老师顾伯明曾是滨海最有名的民间艺人,雕塑、剪纸、绘画,都很在行。

文化馆经常举办活动,人手有限,就会把在公园看门的顾伯明借过来帮忙。这样顾正军也就成了文化馆的常客。

顾正军真正与文化馆发生关系,是在1966年。那年文革发生,顾正军刚上小学,文化馆要成立一个红小兵美术小组,就在全县小学搞选拔赛。结果刚上学的顾正军被选上了。“他成了文化馆有史以来最小的工作人员”。

相遇于此,成长于此

顾宝新的父亲是顾乃深,他是一位画家。解放前,顾乃深就参加了革命,工作主要是做美术编辑,解放后,他先后在扬州、南京和盐城的报社工作。

顾乃深的连环画很出名,在南京的时候曾经与名家田原、高马得共事。他画的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是业内的经典。

1969年,与国内的好多人家一样,顾乃深全家从盐城下放到了老家滨海,具体目的地是滨海县坎南公社洪套大队,住到了农民家里。

1973年,当时的滨海县委书记,把顾乃深调到了滨海县文化馆当馆长。顾宝新在第二年也进了城,在滨海中学读初二。

和父亲一样,顾宝新身上也有艺术天分。“我小时候临摹父亲的画,但他从来不让临,说自己画得不够好。”

这样,顾宝新就和顾正军在文化馆会师了。那个时候已经不叫红小兵美术小组了,因为组员都上了初中,馆里就把“红小兵”改为“青少年”。

林彬也是同一年进的文化馆,



左图为书法家李敦甫,1976年,其风格独特的缪篆“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”联(下图1)应邀参加“中日书法交流会”展览,饮誉扶桑
右图为连环画家顾乃深,下图2为其经典连环画作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内页 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

只比顾宝新迟一点。

“推开窗,就可以看见自己”

当时,林彬的家与文化馆一墙之隔。他推开窗就可以看到文化馆的院子,经常看到有人在排练,有人在画画。

他对窗外的风景很羡慕。

受哥哥的影响,林彬也喜欢画画,但不是很自信。有一天,他去文化馆看馆内的画展,当看到顾宝新的画时被震动了。“我觉得必须加入他们。”

于是,林彬拿了自己临摹的连环画,去给顾乃深看。他记得顾乃深没多说什么就让他过来了。

“终于,我推开窗就可以看见自己了。”林彬说。

文化馆里,文人扎堆

如今,李敦甫的名号在滨海已经无人不知,被誉为当地“书圣”。但是在文革时期,这个名字“暗淡无光”。

文革前,因为历史问题,李敦甫被安排在一个小学教书。文革开始后,他被借调到了县文化馆。

顾乃深当馆长后,做了很多让人日后称赞的事,其中一个就是把李敦甫正式调了过来。还有就是,他把当时下放在滨海农村的一批艺术家,都调到了文化馆。

文化馆变得热闹起来。

那其中有很多真正的“大家”,顾宝新说,他很难想象,如果不下放,那些“大家”会到一个苏北穷县的文化馆来。

广阔天地
大有作为



后果是,两个小子都挨了打。

少年和连环画一起成长

当时,几位少年的主项是连环画。

“一个是容易上大画廊,一个是身边有一个大家——馆长顾乃深。”林彬记得那几年,顾乃深经常有连环画出版。这对他们是一个激励。于是,少年们一个个暗下决心,希望能画出自己的第一本书。

当时的滨海县文化馆,曾经属于一户有钱人,院内的房屋有好几间。少年美术小组和李敦甫、顾乃深一个房间,或者说一个办公室。李、顾的办公桌靠墙摆着,小家伙们则有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,大家围着坐。

顾乃深的教学方法很特别,就是让他们自己去临摹当时最火的一些连环画,不仅要临,而且要背。“结果是,只要我们看到一个连环画作品,就能准确地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,胳膊、头发、腿,就能知道它是抄谁的。”

顾正军记得顾馆长有一个要求很特别,就是用眼睛去打稿子,用眼睛去构图,不要在纸上改来改去。这个要求让他受益匪浅。

少年们成长得特别快。没有多少时间,他们已经能够参与正式出版物的创作了。有好几本连环画,都有他们的作品。

林彬记得有一次,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特地到滨海来采访他们。“这给我们带来了虚荣,也带来了信心。”

这些旧时光,已经跟老文化馆一起消失了

林彬在文化馆一共待了四年,对比之后的大学生活,他觉得文化馆的四年才是他的大学。“这是我的大学,完全是开放式的,学习是通过创作完成的。”

有一个场景让他终身难忘。他们一般都是上午去文化馆,下午到学校上课,晚上会加班,而加班每人有两毛钱的补助。“有一天晚上,大家画好画,然后胳膊挽胳膊在巷子中走成一排,一边走还一边唱着歌。”他们的目的地是不远处的一家面馆,一碗几分钱的阳春面,让他们心满意足。

1976年,顾宝新高中毕业,他先到一家林场插队,然后考上大学,在南京工作,然后辞职,成为一名职业画家。1977年,林彬高中毕业,同样先插队,然后参军,后来也成为一名职业画家。

顾正军也走上了差不多的道路,但他后来回到了文化馆。如今,他已经是“顾馆长”了,就像40年前的顾乃深一样。

不一样的是,“老文化馆”已经消失了,新的文化馆高大漂亮,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那些味道。

如果说文革对于文化来说,是一个严酷的寒冬,但是在顾乃深“主政”的那年,小县城的文化馆迎来了一个小小的春天。

李敦甫有“独特教学法”

顾宝新、曹干、林彬、顾正军都属于连环画创作组,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受到了李敦甫的调教。

顾正军和李敦甫的接触时间最长,感触也最深。“李大爹就是世外高人。”

在滨海,无论老少,或者官员,对李敦甫一律以“李大爹”称之。

顾正军回忆说,李敦甫对他们的共同要求是:多读书。

“他说文字由文和字组成,如果你只会写字,那只是一个文抄公;字由文托,练书法的人在过去被称为‘仕子书’,意思就是有学问的人才能写书法。”

顾宝新很清楚记得李敦甫要求他抄两遍《说文解字》,但是因为他自己懒,也因为志不在书法,而没有照着去做。

顾正军记得,李敦甫为了让他们练好字,特地做了好几块楷模。楷模就是把楷书刻在一块砖头上,然后拿一张纸去拓,然后在纸上描。“也可以直接用毛笔蘸着水在楷模上写。”

李敦甫是一个很严厉的人,但是他又有很容易近人的一面。

顾宝新和顾正军都提到了一件事,他们曾经趁李敦甫不注意,把墨汁涂到他的眼镜框上,结果天热流汗,把墨汁给稀释了,墨水淌了他一脸。